

梁启超

和

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LIANGQICHAO HE ZHONGGUOGUDAIXUESHUIDEZHONGJIE



蒋广学
●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梁启超

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蒋广学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蒋广学 著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 版：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市马家街31号，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照 排：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金 坛 市 教 学 印 刷 厂

(金坛市江南路1号，邮政编码：2132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5 字数 335 000

2001 年 11 月第 2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1—2200 册

ISBN 7-5343-3221-4

G·2935

定价：28.0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马洪林

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结构中,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学识渊博,思维活跃,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他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其学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新闻、文化艺术、文字音韵、语言、目录学、宗教等,淹贯经史,参驳古今。他治学极富开放意识,追踪时代脉动,与学俱进,与势俱进,广泛吐纳东洋的西洋的知识新潮,脱胎换骨,踵事增华,不断丰富和构建着自己的学术思想大厦。梁任公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学术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学贯中西的博大文化学术格局,一直吸引着海内外学人的研究兴趣。近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間直樹教授组织日本学者举行《梁启超研究》共同研究班,三年之间,定期讲论,出版专著,声名远播。

蒋广学教授好读梁任公书,每有会意则废寝忘食,文思涌流,笔耕不辍,吉光片羽,积久成帙,结构成《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一书,特意从南京送之寒舍,赐我先睹为快。我每读一章,必前后联想,再寻觅一些书稿中引注的相关著作

2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阅读,慢慢地读出了兴味。当然不是被蒋著牵着鼻子走了,而是对学术真知的回应与相契。不难看出,蒋广学教授为了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下功夫读了三层书。第一层是读梁任公书,他用几年时间,逐篇逐部,孜孜矻矻,读完了四十册近千万言的《饮冰室合集》;第二层再读梁任公读过的孔、孟、老、庄、墨、法诸子百家,直至后世新儒学诸家书;第三层读海内外学者研究梁启超的书,尤其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理论,分析透视梁启超思想的底蕴,更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海纳百川,学术东流,这就把梁任公学术思想的“本义”、学者研究梁任公的“他义”和自己独立构建的“我义”汇成一条流淌的河,使本书的理论追求具有极大的学术生命力和历史穿越力。

蒋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是作者学术自主意识的体验,还梁任公一个学术“真我”。梁启超在为乃师康有为作传时,曾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著名领袖克伦威尔之言曰:“画我须像我”,呼唤历史的真实和学术的真实。然而,长期来“借鉴史学”覆盖史学领地,“路线评判”制约哲学殿堂,泯灭了作者的学术自主原则和作品的独立个性,学术沦为政治斗争的婢女。康、梁因有改良主义者的恶谥,他们的学术思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蒋著摒弃对梁氏学术观的种种解释,转换视角,另辟蹊径,从《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中找到了解开梁氏思想倾向的钥匙,然后登堂入室,透视了梁启超受明治维新学派辐射的光谱,断定梁任公举起“自由”旗帜之时,即与康有为学术分途之日。作者继而从法家、墨学、老庄、儒家、佛学、清学入手,沿着梁任公的学术出路,一步一个脚印,探讨了梁启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展示出梁任公“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中国学术观的主体风貌。过去我们对

张之洞最乐道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目较多,而忽视了梁任公高度概括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中国学术观的历史价值。本书以此为主旨,阐幽发微,议论宏通,证明她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碰撞结婚生育的宁馨儿。这种过渡形态的学术观,代表着近代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期的文化形态,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要流向,而梁任公就是这种思潮的执牛耳者。

蒋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不特立论自成一派,而且在写作结构上有自己的面目。他打通文、史、哲的壁垒,合各学科而治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随着近代学术的分流,文史哲各树一帜,文重形象思维,史重考镜源流,哲重理论沉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语言和著作范式。蒋广学教授说,他的著述“与其说是阐明某种观点,不如说是在发泄某些感情”。读蒋著使人充分感受到这种学术热流的蒸腾,就像一团奔突的地火在他胸中燃烧,厚积而薄发,一吐而快意。令人赏心悦目的每章题记,一改通常学术论著内容提要的枯燥格式,而以诗人的激情,散文的笔触,哲人的理智,谱写出一段哲理性的华彩乐章,吸引你不能不去阅读他的正文。如果说,梁任公的著作偏重以史为文,那么蒋著则是以文为形式,以史为载体,而哲思才是其灵魂。梁任公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以“复古为解放”张其军,正说明那个时代在理论上的贫困。所以,他不得不借用儒家的明心见性说、墨家的非命说、道家的自然说、佛家的业力轮回说,而推行自己的近代学术观念。有人批评梁启超的学术观“流质善变”,有人非难梁任公“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前后矛盾。平心论之,梁任公学术观的变化不居,正反映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迅猛异常;梁任公在学术上不断反躬自问,正体现着一代学术

4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宗师上下求索的执著。蒋著特别指出,梁任公这种流变与自省,并未停留在对中国文化元典的咀嚼与回味,而是向前追寻时代前沿的理论创造。他用“自由主义”的酒杯,浇开了“今文经学”的块垒,他用学者的独立意识,争取到个人人格的自由。余以为梁任公的学术创造和理论构架,不能笼统地说都失败了,作为一种新型的学术观念和文化现象,它对改造中国旧学推陈出新,引渡西方新学在中国插队落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可以说,没有戊戌维新的思想解放,没有辛亥革命的爆发,没有康、梁对旧学的改造,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梁启超以西方学术观念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清代学术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总结,而蒋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是对梁任公这种学术总结的总结,即对梁启超的中国学术观作出历史的价值判断和时代的价值判断。近年有的学者提出学术研究应注意文化十字架问题,即正视纵向的民族性和横向的时代性交叉坐标。民族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性随着民族性的发展而发展。蒋著在梁任公对儒、佛、道、法、墨的研究中,追索其学术源流;在梁任公对康德、卢梭、霍布斯、达尔文、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企德、培根、笛卡儿、亚当斯密、布伦奇利(旧译伯伦知理)等西哲的研究中,跟踪西学东渐的渗透力度。中学与西学在梁任公胸中交战,形成了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体系,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时,蒋著言人所不敢言,消除了过去对梁任公的许多误读。例如,此前我们总认为在本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辩论中,梁启超扮演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角色。蒋广学教授经过认真考辨,认为梁启超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相信将来中国肯定要

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 20 世纪的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好试验场。经过七十多年的实验,可知梁任公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仍然包含着许多科学的颗粒,从而为这位行铸“小康”神往“大同”的思想家争得了“第二次解放”。

对梁启超的中国学术观称得上进行科学性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一直把他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痛加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学者冲破禁区研究梁启超,但基本上还徘徊在分类排比资料阶段;自从提出“科教兴国”方针以来,学术界思想空前活跃,从总体上深入民族文化宝库,从战略上吸收世界文化遗产,学术著作林林总总,给人以新桃换旧符的感受。蒋广学教授新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应运而生,为梁启超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模式,是近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创获。

值得一提的是,蒋广学教授对他人研究成果极为尊重,不论是前辈大师,还是同辈学人,抑是后起之秀,都不盲从,不排斥,不掠美,含英咀华,食桑吐丝,把梁启超学术研究推上更高深的层次。太史公记李斯言曰:“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蒋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斯之谓欤! 谨序。

1998 年 3 月于沪读漕河泾

目 录

序	马洪林
---------	-----

第一编 走出“今文经学”心路历程

第一章 理解《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思想倾向的一把钥匙 ——读《与严幼陵先生书》.....	1
一 严复致信梁启超的背景分析.....	1
二 严复书信对梁启超的影响.....	9
第二章 自由:消解“今文学”传统的锐利思想武器 ——兼论日本维新学者对梁启超思想转折所起 的作用	23
一 梁启超近代“自由”观的基本确立	26
二 梁启超对“自由”的深层理解及新型历史观的形成	37
三 余论:康、梁学术分途及梁启超执“言论界之牛耳”	48

2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第三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

——兼论梁启超“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学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56

一 “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

58

二 对中华学术原始精神阐释之一：“重民意”的开明政治理想

66

三 对中华学术原始精神阐释之二：“轻生死”的尚武精神

76

四 结论：梁启超“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学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87

第二编

梁启超“不中不西、即中即西” 的中国学术观

第四章 论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 ...

94

一 中华文化得以新生的“卧薪尝胆”之路

96

二 梁启超关于传统文化向现代发展的几个基本观点

103

第五章 论梁启超的政治与法哲学思想

——兼论梁启超对法家思想的研究

124

一 横截面上显示出的时代差异：对中华法系的形成及本质的认识

127

二 历史空间的追求：平衡梁启超最终关怀与现实企划的几项原则

140

第六章 从笃信墨学到走出墨学的转折

——论梁启超对墨学的研究

155

一	论“天志”之两端：“非命”与“兼爱”，企以墨学成为“新”民之利器·····	157
二	《墨经校释》中对墨子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现代阐发·····	167
三	对于墨学的思想结构和本质的科学阐发·····	173
四	结论：从西学论墨子到以世界学术发展的目光论墨子的转折·····	179
第七章 论梁启超对老子及庄子哲学的研究		
	——兼谈梁启超对屈原、陶潜情感哲学的认识·····	186
一	通老：道——弘“天道”而小“世人”的自然主义哲学·····	188
二	达庄：“真我”——畅游于天地之间的主体哲学·····	199
三	屈、陶的情感哲学及老、庄思想在梁启超世界观中的地位·····	208
第八章 儒学“修己安人”之大义与梁启超“明心见性”之微言		
	——论梁启超对儒家道术的研究·····	218
一	儒学之“大义”——“修己安人”·····	220
二	梁启超之“微言”——“明心见性”·····	226
三	梁启超为儒学设定新的心体学说的企图·····	235
第九章 论梁启超对佛教的信仰与改造·····		
	248	
一	力发佛教“科学”与“平等”的“入世”精神，把佛学纳入改造国民品格的新文化体系·····	250
二	简析中国佛教发展史，说明改造佛教的历史合理性·····	260
三	以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分析佛学，力图创立含现代科学知识的新佛学·····	265

4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第十章 以佛治史 心归于佛

——评梁启超的史学观····· 278

- 一 以佛家法相说治史是对早年有关“历史是自由意志发展史”观念的继承····· 281
- 二 以佛家“互缘”说为基础的史学研究方法论····· 291
- 三 心皈于佛的“史才四长”说····· 299

第十一章 向科学与民主新“人学”匍匐前进的清代学术

——论梁启超对清学的研究····· 305

- 一 萌发近世“时代思潮”的清代启蒙期学术····· 307
- 二 戴、章学术和实现方法之革命的乾嘉考据学····· 317
- 三 晚清“今文学”运动:孕育新学的母体····· 326

第三编

梁启超对未来学术的最终关怀

第十二章 行铸“小康” 神往“大同”

——论梁启超在 20 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

辩论中所承担的历史角色····· 343

- 一 前论:《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对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 346
- 二 正论:20 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梁启超所承担的历史角色····· 351
- 三 结论:行铸“小康”、神往“大同”的伟大思想家····· 362

第十三章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科玄大战”与梁启超“三达德”的教育

思想····· 369

- 一 梁启超重新执教的原因分析····· 371

二 “科玄大战”对梁启超中西文化观及教育思想 的影响·····	375
三 以人格教育为中心的“三达德”教育思想·····	384
附：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关系 ···	394
后记·····	423

第一章 理解《时务报》时期梁启超 思想倾向的一把钥匙

——读《与严幼陵先生书》

他的胸中装满了干柴，
一颗火种就能让他全身燃烧起来；
他的脑际布满了乌云，
一道闪电便可化为汪洋大海；
他的心田到处都是含苞欲放的花蕾，
一夜春风，就能走进鲜红的世界。

——本章题记

一 严复致信梁启超的背景分析

近代中国，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张之洞《劝学篇·序》）千年未有之局，造就千年未有之人物。发生在100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事件。而这一事件恰恰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连在一起。康有为是“教主”，而梁启超奔走呼号，助师发动

2 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时务学堂、保国会，燃起变法之火；又以其《时务报》为阵地，把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传布到全国，时人并称“康梁”。历史把他奉为与康有为、孙中山一样的救危扶颠的英雄人物。

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处在上升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把古老的中国拖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能不使中国人走上反抗的道路；而战胜他们的武器又不能不从他们那儿学来。怀有民族自尊的志士仁人正是带着这双重的羞辱创造着历史。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来，它首先衍生出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使那些怀抱救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进一步清醒起来：仅仅有器物层次的革新还不足以救国，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改革腐败的王朝政治，才能与处在新兴阶段的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争高低。首先认识到这一步的是那些洋务派中的左派人物，如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就明确说过：“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郭嵩焘日记》，卷3，第444页）郭氏所谓西法之本者，通商也、政教也、人心风俗也。人们都称赞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办洋务之功，称李“能见其大”、沈“能得其实”、丁“能致其精”，而他则不以为然，在使英期间给自己的好友朱克敬的信中说：考求李、沈、丁诸大人，无能为役。“精神才力，穷极推求，亦万不能逮。独所及见透顶第一义，则亦有诸公所未及者。”（《郭筠仙手札并跋》）这就是说，李、沈、丁诸公连通商之义还未搞得很清楚，更不要说政教和人心风俗了。而另一位出使英法义（意）西的薛福成，在出使之前曾写过《筹洋刍议》，出使后写过《出使四国日记》，也明确提出废科举、兴学校、设议院的思想，而在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

“买办”实业家兼思想家的郑观应,以其特有的智慧,在1890年所写的《盛世危言》(5卷本)中将“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放入器物的层次,称这些学问“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郑观应集》[上],第272—273页)易惠莉博士在《郑观应评传》中引用了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对郑氏这一思想的评价:“天学与地学是构成洋务论的因素,而人学则包含洋务论及变法论的因素。把变法的因素也一并列入西学的内容中,这一点应该说是郑观应别开生面的分类。”^①看来,洋务运动发展为“变法”运动不仅是客观形势所必然,同时也是思想发展所自然也。

人们现在评价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时,常常把“变科举、兴学校、学西学”和“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思想说成高于洋务派的地方,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了郭、薛、郑氏之言后,就可明白,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表现康有为的思想特色。认真说来,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诸公,他们作为身系国运的洋务大臣或大臣们的幕僚,一方面不可能将西方政教、通商、风俗人心的学问像作为布衣之士的康有为那样彻底地“搬运”过来,同时从学理上说,他们像曾国藩一样走的是理学经世致用的道路。在理学的名教纲常学说的束缚下,他们只能做那些皇室特别是后党认可的事,不能做有违名教纲常的事;只可依靠皇室自我实行自上而下的新政,而不会参与像“公车上书”那样自下而上的运动。康有为作为布衣之士,没有他们那样沉重的包袱,大难临头、国之将亡的时代命运给了他深切的使命感,使他冲破了理学名教思想的束缚而走上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治学道路,从万木草堂向他的学生直接宣讲《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到前部书的出版刊行,他直言不讳

地宣传公羊三世、三统之说,在中国政治界思想界掀起一股狂飙。康有为的思想深处是“搬运”西方思想,特别是进化论和民主立宪的主张,但他在形式上却高扬国人(特别是统治阶级)所信奉的孔子,从而给自己的变法理论披上“封建政府法定经典的外衣。”^②这是他的高明之举,也是他的失足之处。梁启超作为康门之高足,于1896年8月在上海出任《时务报》主笔,在其《变法通论》中,一方面直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另一方面则说:“《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全书简称《文集》,之1,第8.2页)他是既要积极鼓吹变法理论,同时又要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披上浓重的古典外衣。梁启超的工作给了他无上的荣誉,但在同时,康氏之学天生的弱点也遗传给他,其《古议院考》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例。

在康、梁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手段鼓吹变法思想的时候,在天津的严复以崭新的西方思想阐明变法理论。严复(1854—1921),字幼陵,又字几道。1866年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校,1877年后被派到英国留学三年,回国一年后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北洋水师任职,从学术上说,他除了从事《群学肄言》、《天演论》的翻译外,从1895年2月起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诸论,宣传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批判儒家学说,在学术界成为维新变法的激进派人物。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写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又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